陈妙华的本土认同与跨族群文化中介实践——以伊沙・卡玛里小说译介为中心[1]

洪韶瑾[*]、黄丽丽[**]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学院

摘要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逐渐出现一批积极学习马来语、参与马来文学创作与译介，并推动跨族群文化交流的华人文化工作者。陈妙华（Chan Meow Wah）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她早年自中国南来马来亚，后长期居住新加坡，并通过马来语学习、文学翻译、刊物编辑及马来文创作等实践参与新马社会的文化建设。本文以陈妙华翻译的伊沙·卡玛里（Isa Kamari）《一片热土》与《刺哇：白礁岛悲剧》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译者生平、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后记及相关文化实践，探讨其马来文学译介与本土认同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陈妙华挑选的伊沙小说主要涉及新马历史记忆、族群关系、地方空间及边缘群体等议题，这些内容与其长期关注华马文化交流及本土社会的文化实践形成呼应。在翻译过程中，她通过保留马来语词汇、双语呈现地方名称及补充文化解释等方式，使马来文化与新马地方经验得以进入华文阅读空间。与此同时，《刺哇》译后记以及她编辑《马来文坛群英》与《马来语月刊》等实践，也显示其身份认同并非单纯建立于出生地、族群或居住地，而是在语言学习、历史经验与跨族群文化实践中逐渐形成。陈妙华的翻译不仅具有语言转换功能，也体现了她作为华马文化中介者，参与本土社会、传播地方文化记忆及促进族群理解的文化实践。

关键词：陈妙华、伊沙·卡玛里、马来文学翻译、本土认同、文化中介

[1] 本文为拉曼大学研究基金资助之研究计划“文化交流的桥梁：《马来语月刊》在华马文化交流中的角色”（编号：IPSR/RMC/UTARRF/2025-C1/L07）的部分成果。感谢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提供《马来语月刊》资料供本研究阅览。

[*] 洪韶瑾，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学院硕士生。电邮：shaojin0502@1utar.my
[**] 黄丽丽，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学院助理教授。电邮：wongll@utar.edu.my

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26 年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4, No. 2 (2026)

Chan Meow Wah's Local Identity and Cross-Ethnic Cultural Media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Promotion of Isa Kamari's Novels[2]

Ang Shao Jin, Wong Lih Lih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bstract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cultural intellectual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began actively learning Malay, engaging in Malay literary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and promoting cross-ethnic cultural exchange. Chan Meow Wah w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among them. Originally from China, she migrated to Malaya at an early age and later lived in Singapor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hrough learning Malay, translating literary works, editing publications, and writing in Malay, she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Malayan and Singaporean society. Taking Chan Meow Wah's translations of Isa Kamari's *Satu Bumi* and *Rawa: Tragedi Pulau Batu Puteh* as its primary research subjec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translation of Malay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r local identity by drawing on her life history, selection of literary tex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or's afterword, and related cultural practi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sa Kamari novels selected by Chan Meow Wah primarily address issues of historical memory, ethnic relations, local spaces, and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These themes resonate with her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Chinese-Malay cultural exchange and her cultural engagement with local society. In her translations, she employs strategies such as retaining Malay words, presenting local place names bilingually, and providing additional cultural explanations, thereby bringing Malay culture and local experiences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into the Chinese-language reading sphere. Meanwhile, her afterword to *Rawa: Tragedi Pulau Batu Puteh*, together with he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Wajah Sasterawan Melayu* and her editorial work for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her sense of identity was not determined solely by birthplace, ethnicity, or place of residence. Rather, it was gradually shaped through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ross-ethnic cultural practices. Her translation thus served not merely as a process of linguistic transfer, but also as a form of cultural mediation through which she participated in local society, transmitted cultural memories of the region, and facilitated greater understanding among different ethnic communities.

Keywords: Chan Meow Wah, Isa Kamari, Malay literary translation, local identity, cultural mediation

[2]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Bridging Cultures: The Role of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in Chinese-Malay Cultural Exchange," (IPSR/RMC/UTARRF/2025-C1/L07) funded by the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Research Fund.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express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for providing access to materials from *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for this research.

一、前言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处于建国初期，政府极力推动民众学习马来文，因此当时新马两地的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文的热潮。华人作为两地的重要族群之一，不仅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在文化与教育的领域上颇有贡献。然而，除了捍卫华文教育外，还有一部分华人正积极推动马来文的发展，将马来语带入华人社会里，让更多的华人有机会接触学习马来文，同时了解马来文化。这一群人我们称之为华马文化工作者。陈妙华可谓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她翻译马来文小说、使用马来文创作、编辑刊物等，在新马地区华人文化与马来文化交流上扮演着中介角色。

陈妙华，1937 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祖籍为客家揭西，后移居新加坡至今。其笔名有丁娜（Tinoh Chan）、白霞等。陈妙华还是“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3]唯一的华裔理事成员，与其他马来作家齐名，凸显其在华马文化交流上的独特地位[4]。论及陈妙华在华马文化上的付出，其作为跨文化译介者的贡献最为重要。陈氏在这六十年间的译介视域不仅限于长篇小说，她还翻译短篇小说、报章社论、散文等，这些译文里有马来民间故事、中国古典文学、新马及印尼社会历史相关的文本。

陈妙华将大半生都投入华马翻译工作，她在马来文学传播与译介上贡献良多，还是马来长篇小说译介的开创者。陈氏至今已出版十余部译作，其中多数为散文集、人物传记、地名手册等。本文之所以选择伊沙·卡玛里的小说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是因为陈氏所译的四部长篇小说中，伊沙的作品便占了三部。在陈妙华所译的三部伊沙小说中，本文将主要选取《一片热土》与《刺哇：白礁岛悲剧》作为讨论对象。其原因在于这两部作品较多涉及新马本土的历史，而《悲君统治》的内容主要聚焦于新加坡开埠的历史，且后者是陈氏与温昌合译，较难区分陈氏的个人翻译理念。由此，本文将从陈氏的生活经历与时代背景出发，探讨其对伊沙小说的译介，再分析她如何通过翻译实践将本土的历史与记忆带入华文读者的视野之中，促使华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接触新马历史，并形塑对本土的认同。

现有研究对于伊沙·卡玛里小说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历史记忆、族群身份、新马政治关系及边缘群体等议题；有关陈妙华的研究，则较多关注其马来语学习、马来文学翻译、国语运动及华马文化交流等实践。然而，学界较少将陈妙华作为译介者的身份与伊沙·卡玛里小说的地方书写结合起来，进一步考察她为何选择特

[3] Angkatan Sasterawan 50（五十世代作家行列），简称 ASAS 50，成立于 1950 年 8 月 6 日，是一个由马来知识份子与作家共同组成的文学组织。其组织强调“Seni untuk masyarakat”（艺术为社会服务），主张文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文学向社会大众传达启蒙意识与独立精神。此外，该组织也积极推动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发展，并致力于提升马来文学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力。

[4] 陈妙华是 ASAS 50（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永久会员，于 2000 年至 2003 年担任该会理事。2005 年，该组织颁发文学贡献奖（Anugerah Bakti Persuratan）予陈妙华，用以表彰她作为首位非马来人理事，数十年来在跨族群文学译介与华巫文化架桥上的杰出贡献。

定的马来文学文本，以及这些文本如何经过译介进入华文阅读场域。尤其是陈妙华在处理马来文化词汇、宗教用语及新马地方名称时采取的翻译方式，与其自身长期形成的本土文化意识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此，本文不将陈妙华的本土认同简单视为其出生地、居住地或族群身份所决定的结果，而将其置于语言学习、历史经验、文学翻译及跨族群文化实践的脉络中考察，借此说明文学与文化译介如何成为她理解本土社会及参与华马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

二、语言实践、历史经验与陈妙华本土认同的形成

陈妙华于 1947 年跟随着母亲到马来亚的吉隆坡，于 1953 年到南洋女中就读初中。陈氏在读南洋女中时，曾是中学联的一份子。1956 年，她与其他中学联的学生前往印尼参加亚非学生会议。该年从亚非学生会返新后，9 月 24 日殖民地政府引用“社团注册法令第十七条”指控中学联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违反注册规定，宣布吊销其注册（吴小保，2021，页 138）。陈氏因此遭学校开除，为了暂时躲避政府的追捕，她只好辗转于朋友家避难，也正因此她开始接触并学习马来文。

如果说南来经历和历史变迁构成了陈妙华本土认同形成的社会背景，那么马来语学习则是她真正进入本土社会的重要媒介。陈妙华最初接触马来语，并非来自正规的高等教育体系，而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与个人兴趣中逐步建立语言能力。她在避难期间先接触中国经典著作，后来开始阅读马来文和印尼文书籍，并通过马来小学课本以及印尼语—汉语词典学习马来文；在取得马来文原著 *Nyawa di Hujung Pedang*（后译为《刀尖下的生命》）后，她一边查阅词典，一边读完整部作品，并开始将翻译视为自己练习语言的方式。

这一经历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陈妙华的马来语学习很快由语言学习转化为文化阅读，再由文化阅读进入文学翻译。她并非为了掌握一项实用技能而学习马来语，而是在阅读马来文学的过程中逐渐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经验。尤其是将《刀尖下的生命》由马来文译成中文这一经历，使她从马来文学的读者转变为华文世界中的马来文学传播者。此后，她于 1959 年取得马来文考试资格，并进入人民协会青年领袖训练班；毕业后担任翻译员，同时获得在马来语夜学班教授马来语的资格。

这一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学习—使用—传播”：学习马来语使陈妙华能够进入原本以华文为主的生活之外的语言空间；使用马来语则使她逐渐参与本地社会的实际文化活动；而翻译和教学又使她将自身获得的语言能力转化为文化传播的资源。换言之，马来语在陈妙华的生命经验中具有超越语言工具的意义，它成为连接不同族群、理解本土文化以及参与社会建设的媒介。

从本土认同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意味着陈妙华并非只是“身在本土”，而是通过语言主动进入本土。语言在这里发挥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一方面，她通过马来语认识马来社会；另一方面，她又将所认识的马来文学与文化重新带入华文阅读空间。这种双向流动，使她的身份逐渐超越单纯的华人移民身份，而呈现出一种具有跨族群特征的文化中介者身份。

三、从选本到译文：伊沙・卡玛里小说译介中的本土认同

陈妙华从事译介工作长达六十余年，期间共出版十八部作品[5]，其中部分为译作，另有作品合集等其他著述，其翻译范围则涵盖散文、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纵观陈氏的译介活动，她在 1959 年出版《刀尖下的生命》后，时隔四十年才再次涉足长篇小说翻译。在此阶段，除了阿都干尼·哈密的长篇小说外，她所译介的马来长篇小说主要集中于同一位作者，即伊沙·卡玛里。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可以表达作者的情感与思想，而一部优秀的译作亦能体现译者的思想与观念。文学的翻译等同于原作的二次创作，既然是二度创作，译者不可能不顾语法语序等字字句句将原文翻译予读者，因此翻译里的用词和句式表达等等往往透露着译者的个人想法。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改写理论”（Rewriting），并说明翻译是最容易被辨识出来的一种“改写”形式，由于它具有潜在的最大影响力，因为它能够在另一种文化中再现某位作者或一部（或一系列）作品的形象，从而将该作者和这些作品提升至其原有文化之外的范围（Lefevere, 2017, p. 7）。本文首先探讨伊沙·卡玛里作品主题思想与陈氏选本理念之间的关系，再借助“翻译作为改写”理论分析陈氏的翻译实践及其译文所呈现出的本土认同建构。

《一片热土》于 1999 年被译成中文，讲述了“我”来到回教堂旁祭拜祖母阿敏娜（Aminah）时遇上一位掘墓人的故事，以对话书写及回忆的方式讲述“我”伊曼（Irman）的祖母阿敏娜原先是华人，中文名字叫陈秀美，在日据占领马来亚时期被一户马来家庭收养，从此皈依回教却无法抉择自己爱情的故事。《一片热土》以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作为主线，实则以抗日抗英作为时代背景，批判殖民者的同时让读者反思殖民时期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不光如此，小说中的另一条叙事线以掘墓人雅西（Yaasir）叙说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方国土的理想与期盼，以反殖民革命里的“跨族群”来说明族群之间同心协力的可能图像，以“马来亚”这块土地为“团结”基础（魏月萍，2019，页 261）。作者在小说中还用虚拟名词暗喻马来

[5] 陈妙华编译的作品集有中文译著：《刀尖下的生命》、《竹棍子》、《辜邦岸》、《河上风云：马来短篇小说选集》、《喀湃·喀湃》、《新华短篇小说集》、《一片热土》、《刺哇·白礁岛悲剧》、《悲君统治》、《一杯酒一碗牛奶》、《红宝石戒指》。马来文译著有：《中国民间传说》和《这一代：马华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他作品包括：《马印译名手册：地名、人名、其他》、《马来文坛群英》、《娘子军登黄山》、《岛国马来风：妙华文集》和《印尼多姿彩》。以上列出的 18 部作品不包括陈妙华合编的马来文词典与《马来语月刊》。

亚和新加坡，如北岛（Nusa Utara）和南岛（Nusa Selatan）这两座岛拥有悠远的历史关系，其中北岛就是马来亚，南岛则是指新加坡，并影射若北岛和南岛能够重新合并，那马来民族将会拥有更好的生活和机会（Sohaimi Abdul Aziz, 2014, p. 60）。在《刺哇：白礁岛悲剧》（以下都会简称《刺哇》）里，作者讲述一群居住在新加坡与柔佛海峡之间的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通过记述原住民的生活来探讨原住民身份认同的关系，同时也让读者追回对他们的记忆。《刺哇》具有记忆铭刻的意义，在于小说以“双重边缘”视角（新加坡马来人和实里达人）叙述一个有别于官方或主流的“代替历史（记忆）”（魏月萍，2019，页 271）。

回顾这两部小说的特点可发现他们的共性有：（一）主题皆围绕新加坡的发展史、（二）使用真实的事件、日期、地点作为故事的背景、（三）故事角色都涉及多种族，探讨马来人身份认同与地位、（四）从马来民族的视角为中心创作。从以上特点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陈妙华翻译该小说的动机在于译者有着在新马两地生活的经验，其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历史之外，也对此地产生了本土认同，因此通过翻译让这部小说走进华文读者的视野里。再回到这两部小说的译文中可发现，陈氏在翻译过程中并非单纯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在不影响读者阅读的前提下，有效传达原作的意义，并有意识地保留原作的文化与语言特征，以下将会结合例子一一说明。

在《一片热土》里写到北岛独立的情节如下：

> “巴督卡！马来人从不曾迁移。我们也不曾动过迁移的念头。即使曾经被英国和日本殖民统治过，马来人也不曾想过要迁移！即使他乡下金雨，家乡下石雨，也还是家乡好！”（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2002，页 271）

马来原文如下：

> “Paduka! Bagi orang Melayu belum pernah mereka berhijrah. Malah tidak tergerak hati kami hendak berhijrah. Walaupan pernah dijajah *British* dan Jepun,belum pernah orang Melayu hendak berhijrah! Hujan emas di negeri orang,lebih baik hujan batu di negeri sendiri! Bukan namanya bangsa Melayu meninggalkan negeri sendiri!” (Isa Kamari, 1998, p. 137)

在将中文译文和马来原文对比后可发现，最后一句的译文有些谬误。按照原句的意思，该句应该被翻译成：“别人国家下的是黄金雨，也比不上自己国家下的是石头雨！真正的马来民族是不会离开自己国家的。”（笔者译）在中文译文里直接省去最后一句，将它浓缩成一句“也还是家乡好”，纵观整句译文，该句的翻译贴近华人谚语的叙述方式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这种处理方式使原本带有强烈马来民族色彩的表述转化成贴近华语的表达。这并非是一种信息删减，而是一种改写策略，即译文弱化了原文的民族主体性，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产生共鸣，而非仅以旁观者的身份阅读“他者”的故事。伊沙·卡玛里作为现代新加坡

的城市马来人、作家，不仅关注马来群体的处境，他对于处在更弱势、更边缘的族群显露悲悯的情怀（魏月萍，2019，页 274）。反观陈妙华所译介的伊沙小说，其文本同样涉及反殖民意识及多元族群社会的现实处境。由此可见，作者与译者在关注殖民历史及族群处境方面具有一定的理念呼应。然而，与单纯为马来群体发声有所不同的是，陈妙华的翻译实践并未局限于特定族群，而是通过马来文学的华文译介、针对文本部分句子上的改写，使不同族群之间能相互认识与理解，并将彼此视为共同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一员，该观点得以通过以上段落的改写得以印证。

异化（Foreignization）是一种以源语文化和风格为中心的翻译策略，目的是为了在译文中保留源语言的文化特色和表达习惯，其方法论包括直译、音译和保留原文。文本中的“Paduka”原本是马来王室的尊称，与中文的“殿下”或“陛下”意思相近。然而，在译文中，该词汇被音译为“巴督卡”，而非直接意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比起单纯追求字面意思上的转换，更注重保留原作的马来文化特色，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文化语境。不仅如此，异化的翻译方式在两部译文中经常可见，如《刺哇》中的叙述：

> “伯伯是伊斯兰教徒？alhamdulillah（感谢真主）。那样我该对伯伯说 assalamualaikum（祝你平安）。”拉密吃惊而高兴地说。
>
> “Waalaikum ssalam（也祝你平安）。Anak（孩子，你）叫什么名？”（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2016，页 64）

从上文中可见，译者在面对文中的宗教用语时，先是保留了阿拉伯原文，再在原文后边补上中文的解释。“感谢真主”与“祝你平安”等是穆斯林的问候语，这些话不只是在进行基本的问候，更是穆斯林信徒对真主的敬畏和赞颂，也是他们生活态度与文化习惯的体现。由此，将原文保留并补充意思的处理方式，不会让该段落显得过于突兀，反而有助于华人更了解马来人的信仰表达。加之，新马本土的社会本是由多元族群组成的，在语言表达上经常会混杂其他语言。译者没有直接抹平两者文化之间的差异，还间接呈现出本土的多语言共存现象。除此之外，这类的处理方式也体现在《刺哇》里〈车厢〉篇：

> “Encik talak (tiada) sakit? （先生不痛吧？）”一个华人用发音不准的马来语问。
>
> 刺哇没有回答。他的肩膀有点痛，因为刚才被那逃跑青年撞倒。他还有些惊慌。
>
> “Cilaka (Celaka) itu pencuri. Orang tua kasi jatuh （该死的贼。把老人撞到了）。”那华人继续说。（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2016，页 78）

在这段原文中，作者有意将“tiada”误写成“talak”，将“celaka”写作“cilaka”，意在于呈现文本中的华人在马来语使用上不够标准的形象。然而，在译文当中，译者并非对这些非标准的词语进行修正，反之在保留原文马来词形的基础上，在括号中补充标准词汇及中文解释。异化的翻译方法一方面让读者能够顺利理解对话内容，另一方面则通过对错误形式的修正和解释，帮助读者掌握规范的马来语词汇。与此同时，译者保留原作中对语言误用的呈现，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原文本的语言特征，还再现作者的叙事意图。

伊沙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但陈氏选择翻译的作品多围绕历史记忆、国家建构等主题展开。透过这三部小说的翻译，陈氏不仅将地方历史传递于华文读者，更引导他们去理解国家形成的历史脉络，在认识共同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建构地方认同。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学》提到：“人群并不只是定出自己的位置，更藉由地方感来界定自我。”（迈克·克朗著、王志弘译，2003，页 136）说明人类的自我认同是通过对地方的经验、记忆与情感建立起来的。新马两地的地名不只是某个地方的标识，其背后往往承载着当地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大多数的地方同时拥有双语地名，而这些名称的形成与华人南来的经历和发展密切相关。在《刺哇》里新马的文化地景经常被提及，而陈氏在翻译地方名字时会在括号里补上各个地方的马来文原名，如：“以前紧急状态时期，也有许多柔佛马来人移居到榜鹅 (Ponggol) 和丹绒伊劳 (Tanjung Irau)。”（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2016，页 39）再谈到地不佬（Tebrau）海峡沿岸的小河时说到：“那些河道是三巴旺 (Sembawang)、佈罗格吉 (Buluh Kecil)、佈罗勿刹 (Buluh Besar).....”（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2016，页 49）在〈回教堂〉篇章里谈到新加坡的甘榜回教堂：“例如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的军人回教堂 (Masjid Tentera) 和布里斯托路 (Bristol Road) 的湖北回教堂 (Masjid Tasik Utara)。”（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2016，页 107）地名本是历史的载体，补充马来原名的翻译理念能够让读者对本土的地理知识有所了解，同时也在提醒读者这些故事并非发生在一个抽象的空间，而是真实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陈氏保留地名的翻译方式让读者对国家地理与历史记忆有所认知之外，试图通过以双语呈现地名的方式让华文读者将这些地方与真实的地理景观产生连接，无形中建构共同空间的想象，促成了本土认同的形成。

除了真实地景的翻译，《一片热土》里也提到：“他把自己和阿敏娜及伊尔汉的关系，比喻成他亲爱的祖国南国 (Nusa Selatan) 与北国 (Nusa Utara) 之重归统一，合并成同愿国 (Nusa Secita)。”（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译，2002，页 162）译者将“Nusa Secita”译成“同愿国”再补充马来原文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该词汇不是普通的地理名词，而是用来象征新马两地空间的地域名称与文学符号，让现实政治关系以隐喻的方式进入文学叙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文学符号，再通过保留虚构地名的方式，让文本中的区域关系变成一种可以被叙述与理解的文化空间，加强读者对本土认同的想象。

考察了《一片热土》和《刺哇》的译文可发现，陈氏的翻译实践并非单纯转换语言，而是在“翻译作为改写”的理论下，让原文化可以在目标文化里呈现出来。从上述被译者“改写”的段落可以观察到，译者与作者在关注边缘族群方面具有一样的理念。然而，译者的改写是在进一步引导读者以整体性的视角看待不同族群，强调各族群间相互理解与共同生活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作者主要通过文学书写关注弱势族群的处境，而译者则通过翻译进行跨族群间的沟通。再者，译者在处理马来王室用语、宗教用语、地名等都有意识地采取异化的翻译方式，即对原文词汇进行音译再以括号的方式补充说明，让原作中的文化元素得以在华文语境中保持可见。她一方面在翻译用语上紧贴华人的表述方式，另一方面则保留马来原文本中华人的形象，还原与尊重作者的写作意图，在两者文化之间取得了平衡。多种语言的混杂与表现恰恰是新马地区最具特色的一面而多语言与文化的混杂性也确立了新马文化的在地性。纵观陈氏翻译的这两本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以双语呈现地名、特殊词汇等，本质上还原了新马地区华人与马来人之间共生的现象。正因此，这两部译文表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接受新马地区本就是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她让伊沙·卡玛里的小说不只是作为文学为人熟知，也作为承载新马历史记忆与族群经验的文本被读者理解。加之，该文本的翻译除了让华文读者更理解马来民族的文化之外，还在跨语言传播中形成一种基于地方经验的认同想象，进一步建构地方的认同。

四、从译者到文化中介：陈妙华的跨族群文化实践

陈妙华通过文学翻译所彰显的本土认同，其根基深植于她早年对马来语的主动学习与实践之中。陈氏 1961 年发表的〈学习国语〉（Mempelajari Bahasa Kebangsaan）一文中指出将马来文学抄写成中文，或将华文作家的作品译成马来文，也是建立国家的努力之一，并立志成为一名对国家有用的译者（Chan Meow Wah, 1999, p. 183）[6]。对陈妙华而言，马来语并非单纯的沟通工具，而是认识本土社会、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媒介。

如果说伊沙·卡玛里小说的译介体现了陈妙华如何将本土认同带入文学翻译，那么她的其他创作、编译及刊物编辑实践，则进一步显示这种认同如何转化为跨族群文化实践。陈妙华在《刺哇：白礁岛悲剧》的〈译后记〉中指出：“这些新加坡马来人的生活和感受，其实也是我国华人的心声。”（伊沙·卡玛里著、陈妙华

[6] 原文：“ Menyalin hasil-hasil karya Melayu ke dalam Tionghua atau mengalih ke Bahasa Melayu hasil-hasil ciptaan pengarang-pengarang Tionghua ini, termasuk juga salah satu usaha yang penting antara usaha-usaha membina negara. Sebab itu aku pun menerima cadangan Wan, menetapkan hati hendak menjadi salah seorang penterjemah yang berguna kepada tanah air.”

译，2016，页 241）陈氏于 2005 年翻译马来作家阿都干尼·哈密（Abdul Ghani Hamid）的小说《红宝石戒指》（*Delima Merah Di Jari Manis*）的译后记再提到：

> 我思索再三，终于决定翻译出来，原因是：一，这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华马两族合作无间、没有种族隔阂的实际情况。第二，当年马来族的落后于华裔，状况至今未有大改善，仍然值得华马同胞关注。第三，至于华裔女主角的形象，她的画家浪漫态度，无论哪个种族都可能有，我们不该从种族角度看待她。第四，阿都干尼·哈密是以诗和画闻名，小说仅此一部，但却写华马两族画家合作组织绘画协会的经过，这在我国马来小说中并不多见，很值得华裔阅读和了解。（阿都干尼·哈密著、陈妙华译，2005，页 99）

陈妙华为翻译这部作品给出了四个理由，而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她的翻译实践并非仅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更寄予了她对新马两地各族群之间相互理解、和谐共存的社会愿景与文化意图。

同样的理念也体现在《马来文坛群英》的编译中。陈妙华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书中所介绍的马来作家不仅推动了马来新文学的发展，也曾为民族独立作出贡献；这些作家“就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许多华人作家那样”，值得各族人民认识与敬重（陈妙华，1994，页III）。她通过整理与介绍马来文学作家，将原本属于马来文文学场域的文化资源引入华文阅读空间，使文学译介成为跨族群认识与理解的媒介。

陈妙华的文化中介实践并不限于文学翻译，也延伸至刊物编辑与马来语教育。《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实践。她担任主编长达八年。期间，她不仅让月刊得以重新出版，还增设了许多马来语学习栏目、编者与读者的互动栏目等，让刊物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元。如第 71 期的《马来语月刊》就有一栏目〈说出真心话〉提到：“为了有系统地介绍马来文知识，我们特约马达君为本刊编了一部课程以享文友。同时为了应付大时代需要，我们增设了〈工商舞台〉及〈外来语辞典〉……”（Abdullah Hussain、Ting Noh，1967，页 2）。在陈氏的接手下，月刊不仅得以复刊，更为华文读者的学习需求增设有关商业及外来用语的马来文学习栏目，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掌握马来文。这一举措与其长期坚持翻译马来文小说、积极推动华马文化交流的实践相互呼应。

由此看来，陈妙华的文化实践形成了从语言学习、文学翻译到刊物编辑与文化传播的连续路径。她一方面将马来文学及文化经验带入华文阅读空间，另一方面也通过马来语学习与刊物传播，使华文读者获得接触本土语言与文化的机会。其身份因此不只是文学翻译者，更具有连接不同语言、族群与文化空间的中介性质。

五、结语

通过对陈妙华译介伊沙·卡玛里小说的考察可以发现，她对这片土地的关注与本土认同，是在特殊的时代洪流与多重的跨族群文化实践中形塑而成的。从青年时期参与印尼亚非学生会议的政治洗礼，到因缘际会下对马来语的自主涉猎，再到长期投身新闻时事、马来文学译介与《马来语月刊》编辑的前沿，这些经验使她得以用一种历史见证者的视角，深刻体察本土社会的变迁，并将其转化为推动跨族群对话的坚实动力。在翻译过程中，她通过独特的策略将伊沙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与弱势族群关怀引入华文读者视野，成功搭建了华人与马来社会之间的情感与认知桥梁。

从更宏观的文化史视角来看，陈妙华作为南来华人的一员，其生平与实践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华人知识分子融入新马社会、建构地方认同的独特路径。面对建国初期的多元族群现实，她没有停留在单一族群的文化堡垒内，而是将马来语视为打破族群隔阂、参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共同媒介。她对马来语的主动向心与对马来文学的深层介入，不仅是一种个体适应本土社会的在地化叙事，更是一场在冷战夹缝与多族群张力中，以文学译介消解族群藩篱的去殖民化实践。正如魏月萍所指出的，这类华马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深刻契合了第三世界精神中独立、自主与跨族群理解的核心诉求（张运华、吴小保，2026，页 178）。陈妙华的个案，为新马多民族社会如何消弭族群边界，构建包容性的本土认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学术启示。

参考文献

Abdullah Hussain、Ting Noh（1967）。《马来语月刊》第 71 期。马来文化促进机构。
阿都干尼·哈密（2005）。《红宝石戒指》（陈妙华译）。新加坡文艺协会。
陈慧娴（2019，4 月 15 日）。陈妙华在翻译征途自强不息与夫君杨贵谊携手共创佳绩。*不惑人文期刊*，（20）。
陈妙华（1994）。《马来文坛群英》。学林书局。
迈克·克朗（2003）。《文化地理学》（王志弘、余佳玲译）。巨流图书有限公司。（原著出版于 1998）
魏月萍（2019）。原住民和移住民：伊沙·卡玛里小说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追寻。*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6），245-280。
吴小保（2018）。马来西亚华社国语运动中的“马来语斗士”——以《马来语月刊》为个案。*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6*（1），93-111。
吴小保（2021）。《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文运企业。
伊沙·卡玛里（2002）。《一片热土》（陈妙华译）。龙科技传播贸易公司。（原著出版于 1998）
伊沙·卡玛里（2016）。《刺哇：白礁岛悲剧》（陈妙华译）。水木作坊出版社。（原著出版于 2009）
张运华、吴小保（2026）。《贵在情谊——华马词典编撰者杨贵谊纪念文集》。华社研究中心。
Aveling, H. (2014). 1819: Isa Kamari on th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Asiatic*, *8*(2), 88–109.
Chan Meow Wah. (1999). *Antologi cerpen Xinhua*. Majlis Pusat Pertubuhan-pertubuhan Melayu.
Ding Choo Ming. (n.d.). *Chan Maw Woh yang saya kenal*. 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83064380/Chan_Maw_Woh_yang_saya_kenal
Isa Kamari. (1998). *Satu bumi*. Pustaka Nasional.
Isa Kamari. (2009). *Rawa: Tragedi Pulau Batu Puteh*. Al-Ameen Serve Holdings.
Isa Kamari. (2014). The vision and creative process of the writer in retelling the Singapore stories. *Malay Literature*, *27*(1), 72–85.
Lefevere, A. (2017).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Mohd Raman Daud. (2020). *Cikgu Ariff yang kukenal*. Institut Pendidikan Nasional.
Sohaimi Abdul Aziz. (2014). The secession of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Satu Bumi*. *Malay Literature*, *27*(1), 53–71.